
阳明心学与企业家精神汇通的 内在机理探究

王永昌 王磊¹

【摘要】阳明心学受到企业界广泛关注，并且参与塑造现代企业家精神，究其原因与内在机理。人文思想与工商伦理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内在关系，是阳明心学与企业家精神汇通的理论前提。阳明心学曾经参与塑造中国传统工商伦理与日本工商伦理，并且在中国现代工商伦理的转型过程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这为阳明心学与现代企业家精神的汇通提供了实践基础。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所需要的实践精神、创新精神、主体精神等与阳明心学本有的精神正相一致，构成了阳明心学与企业家精神汇通的思想契合点。

【关键词】阳明心学 企业家精神 工商伦理 内在机理

引言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阳明心学正在引起学术界、工商企业界等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持续讨论。近年来，关于阳明心学的学习组织、论坛活动、研讨会议层出不穷。学阳明心学，用阳明心学，也逐渐成为企业家群体修养品格、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必修课。阳明心学受到企业界广泛关注，并且参与塑造现代企业家精神，实际上是多元文明在现代工商实践活动中的碰撞与交融，这一时代现象值得从哲学学理层面进行深入探讨。

阳明心学作为中国传统儒学的心学一派，为何受到企业家群体的持续关注？阳明心学为何能够在企业经营管理实践中发挥作用？阳明心学为何能够参与塑造现代企业家精神？这一系列的问题，可以总结为阳明心学与企业家精神汇通的内在机理。我们有必要深入思考并挖掘阳明心学与企业家精神的内在关联性。这一探究也是时代问题与哲学思想相互碰撞和相互影响的必然要求。

一、阳明心学与企业家精神汇通的理论前提

人文思想参与到工商实践活动中，塑造工商伦理，在东西方工商业发展史中渊源已久。中国传统儒学中的价值观念对工商伦理的塑造，始终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孔子弟子端木赐是孔门四科中言语科的代表，被孔子称为达人。端木赐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端木赐在商业上取得的成功离不开春秋时期儒学价值观念的影响。在经商成功之后，端木赐拜访诸侯国君时，仍然以儒家礼仪为行为标准，由此可见端木赐受到儒学价值观念的影响之深。在中国商业发展史中，形成了徽商、晋商、浙商等以地域为划分标准的商帮。每一商帮又有其独特的群体属性和文化特征。而这些商帮的一个共同特点，则是无不受到中国传统儒学的思想品格和价值观念的影响，由此而形成中国商业发展史上独特的儒商群体。中国工商伦理的塑造，始终是在中国传统儒学这一文化背景之下展开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人文思想对工商伦理的影

¹**作者简介：**王永昌，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长，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 310007）；王磊，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杭州 310018）

基金项目：本文系宁波市社科院阳明心学研究重大招标课题“阳明心学与企业家精神研究”（YMXW18-4）阶段性成果。

响和价值。

人文思想对西方工商伦理的影响，历来不乏关注和讨论。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是这一领域中颇具代表性的经典著作。在此书中，马克斯·韦伯首先就提出了一个现象，“在一个各种宗派信仰混杂之处，只消一瞥其职业统计，往往便会发现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此一现象在天主教的报章与文献及德国的天主教会席上一再引起热烈的讨论，那就是：在近代的企业里，资本家与企业经营者、连同熟练的上层劳动阶层，特别是在技术上或商业上受过较高教育训练者，全都带有非常浓重的基督新教的色彩”^④。进而，韦伯对这一现象背后的本质进行了剖析，其中不乏这样一个原因，“天主教较强烈的‘超尘出世’、其最高理想所显示的禁欲特色，必然导致其信奉者对于此世财货不大感兴趣”^⑤，而基督新教伦理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和信仰束缚，鼓励人们从事生产，符合经济发展趋势，进而可以影响到人的经济行为。由此，新教伦理为工业革命的发展提供了宗教基础和精神支持。韦伯的这一理论曾被广泛引用，用以解释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东亚的经济腾飞和现代化发展问题。从历史的实际来看，东亚儒家文明对东亚各国经济发展确实有促进作用，如同新教伦理对工业革命之后欧洲各国经济的助力。若是缺少了人文思想或宗教精神，任何形态的经济模式都缺乏精神源头和持续发展的生命力。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人文思想对工商伦理可以产生一种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影响，助力人们的经济行为。

无论是中国传统儒学影响下儒商群体的形成，还是马克斯·韦伯所阐发的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都可以说明人文思想对工商伦理塑造的作用与价值。而且，从人文思想与工商伦理的关系来看，人文思想与工商伦理相互影响。人文思想参与工商伦理的塑造，同时，每一时代或每一类型的工商伦理成熟之后，反过来又构成了人文思想的一部分。从传统工商伦理到现代工商伦理的发展中，都可以看出这一点。如此看来，阳明心学参与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塑造，也是这一脉络的延续和发展。

人文思想与工商伦理始终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关系。作为中国传统人文思想中的一派典型代表，阳明心学与工商伦理也存在着双向互动的关系。这就构成了阳明心学参与塑造企业家精神的最基本的理论前提。

二、阳明心学与企业家精神汇通的实践基础

在人文思想参与工商伦理的塑造中，阳明心学是一个典型案例。阳明心学归属于浙学传统，是浙学经世致用传统的典型代表。从起源来看，阳明心学正是王阳明在政治实践和战争实践中领悟出来的一套学问，具有强烈的实践特性。阳明心学主张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之上，自然包含着工商实践活动。故而，阳明心学对中国传统商业伦理的塑造有着重要理念引导作用。余英时说：“‘良知说’的‘简易直接’使它极容易接受通俗化和社会化的处理，因而打破了朱子‘读书明理’之教在新儒家伦理和农工商贾之间所造成的隔阂。所以王艮能‘指百姓日用以发明良知之学’。

王阳明以来有‘满街都是圣人’之说。此说解者纷纭，其实乃表示儒家入世承当的伦理非复士阶层所独有，而已普及于社会大众。”^⑥比如，阳明心学曾经在塑造徽商特质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徐国利认为，阳明心学的世俗化伦理观为明清徽商伦理思想的转换和建构提供了思想来源，诸如良知说、体用同源论、百姓日用即道、理欲观、公私观及其唯我论、新四民观及贾服儒行论等伦理观念，不仅影响到明清徽商伦理思想的转换和建构，而且自此之后，对中国工商业伦理思想发展和完善，也起到了重要作用。^⑦

在日本工商业的现代化进程中，阳明心学对日本工商业者的经营活动和经营哲学，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阳明心学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等观念，直接影响到日本德川时代的商人哲学家石田梅岩（1685—1744）。石田梅岩创建了石门心学，倡导知心、知性的思想理念，将正直、俭约贯彻到商业经营活动中，深刻影响了日本工商业发展和工商伦理塑造。另外，稻盛和夫也是受到阳明心学影响的一个典型代表。

稻盛和夫深受其同乡西乡隆盛（1828—1877）的影响，西乡隆盛推崇阳明心学，追求知行合一。我们可以看到，在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中，无论是强调以心为本的乐观、忍耐、正直，还是利他精神、商业乃仁，以及敬天爱人、知行合一，都有着阳明心

学思想的浓厚痕迹。在阳明心学的影响之下，日本企业家将东方传统价值观念与西方现代工商文明对接，实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工商业的繁荣奇迹，塑造了具有日本特色的现代工商文明。

可见，人文思想对工商伦理的塑造有着重要作用。工商实践活动的主体毕竟是人，不同的人文思想自然会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工商伦理产生影响。中国现代工商伦理的塑造必然要受到传统人文思想的影响，其中阳明心学是中华传统人文思想参与工商伦理塑造的一个重要部分。

阳明心学曾经对明清徽商伦理的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曾经影响到日本工商伦理的塑造与工商文明的建构。这就表明，阳明心学与企业家精神汇通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故而，在现今中国，阳明心学参与塑造现代工商伦理、塑造企业家精神，是自传统至现代阳明心学塑造工商伦理这一发展脉络中的一个环节，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继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气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信息时代之后，21世纪的人类已经开始迎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绿色工业时代。伴随着科技、工业、商业如火如荼地发展，世界各国正在塑造着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工商文明。在世界文明的这一发展进程中，中华文明的文明形态正在由以农耕文明为核心逐步过渡到以工商文明为核心，并且正在塑造中国特色的现代工商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现代工商文明的演进以及现代工商伦理的重塑中，有中华文化特色的现代工商文明正在并将越来越成为中国现代文明的重要标识。

在现代工商业中，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更加多元而复杂。与传统工商伦理相比较，现代工商伦理的外延有所增扩，除了传统的工业伦理、商业伦理之外，又增加了科技伦理、企业文化、企业家精神等构成要素。得益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伟大实践，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由计划经济体制转换为市场经济体制。

时至今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迈向成熟。新的经济体制，引发了新的经济关系和新的社会关系。伴随着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中国人民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随之而来的则是人与人之间许多伦理关系需要重塑，由此形成一种新型的伦理关系。

在传统农耕文明中，家庭具有多元化职能，集生产、伦理、文化、社会等职能于一体。就生产的经济职能而言，由于传统农耕文明受到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家庭经济职能的发挥，主要表现为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以农业生产为主，是一种自然经济形态，家庭的社会分工较为模糊并且尚未分化。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的文明形态逐步由传统农耕文明转化为现代工商文明。

相比之下，现代工商文明兴起之后，企业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组织形式，克服了传统农耕文明中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形式的众多缺陷。在传统农耕文明中，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相对分散和落后，生产效率低下。现代工商文明中的企业则将众多家庭结合起来，将家庭的经济职能从传统家庭的多元化职能中分化出来。这是现代工商文明的一大进步。现代企业将家庭的经济职能聚合到一起，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生产效率，逐渐形成了分工明晰、运行有序的现代社会，企业成为现代经济运行的基本单元和动力主体。

于是，我们可以说，在中华文明的现代演进与工商伦理的现代转换的背景之下，当今中国社会的基本伦理组织形式，在家庭之外又形成了一种新的伦理组织形式——企业。企业连接起合作伙伴及全体员工，合作伙伴及每一员工背后又代表着众多的小家庭。由此，以企业为单位，将现代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家庭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型的伦理组织形式。这样，企业家与合作伙伴及全体员工，便构建起一种新型伦理结构，即以企业家为核心，合作伙伴及全体员工组成一个人际性的互动组织。

从经济活动的组织结构讲，传统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以血缘为纽带来连接家庭成员；现代企业则是以契约和法律为纽带来连接众多个人。从社会生活角度讲，企业乃是基于现代工商文明而产生的现代伦理组织形式。在企业中，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契

约性和规则性。由此，现代社会的伦理关系，由传统社会下的单纯的以家庭为形式的血缘自然关系，增加了以企业为形式的契约法律关系。于是，伦理关系的核心纽带，由单纯家庭的血缘性转换为企业员工之间的人际互动性，现代新型伦理关系正是围绕这一人际关系的互动轴而展开的。

在企业这种新型的伦理组织形式中，企业家居于核心地位。而企业家精神则是企业家担当好自身职责所必不可少的基本素养，进而成为现代工商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工商伦理由传统至现代的转型，使得企业家精神在现代工商伦理中作为一个独立的重要组成部分凸显出来。这是阳明心学与企业家精神汇通、参与塑造企业家精神的现实逻辑。由此，阳明心学在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塑造中，可以为企业家精神提供丰富的传统思想资源，从而发挥出其现代价值。

三、阳明心学与企业家精神汇通的思想契合点

人文思想为工商伦理的转换与建构，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与思想资源。阳明心学对中国传统及现代工商伦理的塑造，即是一个典型体现。在中国传统哲学各个流派中，阳明心学之所以能够参与塑造企业家精神，乃是因为阳明心学的思想特质与企业家精神有诸多的契合点。

弗兰克·奈特最先提出企业家精神，后经熊彼特、赫西曼、德鲁克等学者的探讨，企业家精神的核心要素扩展为创新性、爱冒险、精明与敏锐、强烈的事业心、战略思维、变革等。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指出，弘扬企业家爱国敬业、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精神，弘扬企业家创新发展、专注品质、追求卓越的精神，弘扬企业家履行责任、敢于担当、服务社会的精神。随着时代的演进，企业家精神的内涵不断扩展，企业家精神的来源不断多样化。^⑥阳明心学的思想特质与企业家精神的契合之处，我们主要从以下三点展开梳理。

1. 实践精神

阳明心学的实践精神主要表现在知行合一与事上磨炼的思想中。王阳明说：“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己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己自有知在。”^⑦王阳明认为，如果仅仅知道孝敬父母、尊敬兄长的道理，却不能做到孝敬父母、尊敬兄长，这还不算真正的知道孝悌，只有做到了，才算真正知道孝悌。王阳明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⑧

既然知行不可分作两事，而为何又将知行分开来说呢？王阳明认为“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维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一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⑨照此而言，古人之所以将知与行分成两个，目的是为了提醒知而不行的人注意到行的层面，提醒行而不知的人注意到知的层面。分成两个来讲，古人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实际上，知行原本一体。

知行合一正是企业家在经营管理的过程中所追求的一种精神。稻盛和夫在《干法》中说：“回顾自己70余年的人生，我可以向大家断言，以积极的‘思维方式’满怀‘激情’，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最大，做到这些，你的人生一定会硕果累累、幸福美满。”^⑩

稻盛和夫这一说法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商业实践活动者对知行合一的贯彻，由此稻盛和夫提出了一个人生成功方程式，即人生和事业成功等于能力乘以热情乘以思维方式。李明镜认为“在这个方程式中，体现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三者之间存在着联系，同时又具有各自的特点。其深刻内涵可以通过王阳明先生‘知行合一’的理论来进行解读。”¹¹思维方式偏向于知的维度，热情与能力偏向于行的维度。实际上，三者又可以融贯一体。企业家某一思维方式之形成，离不开其充分发挥自身热情与能力所进行的商业实践活动。企业家之热情与能力的实际发挥，也离不开思维方式的作用。

阳明心学所追求的内圣境界就是在生命历程中通过实际的行动和践行不断改变和打造自己，以阳明心学的话语来表述，即是事上磨炼。事上磨炼，乃是阳明心学之家法。事上磨炼，最终要实现的目标在于致良知，其中存在一个开展心性修养工夫的进阶。在《传习录·陆澄录》中，陆澄问：“静时亦觉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养静，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

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¹²陆原静喜欢在静中做工夫，遇事常常失了分寸。王阳明教导他要在事上磨炼，在动中做工夫，无论身处动之境遇，或者静之境遇，皆应该做到定。通过在事上磨炼，所达到的定，才是真正的定，即心之本体的定。

这是事上磨炼的第一步，即无论动静，无论有事无事，皆应心定。事上磨炼第二步，是在心定的前提下，对所遇之事，做出最适当的应对方式。第三步，需要在事上反复磨炼，也即将第一步与第二步反复操练，形成自己应对外事的心理反射习惯。事上磨炼所追求的效果是，无论有事无事，都要做到心定，进而应对每一件事都有一个最恰当的应对方式，这就是对这件事的致良知。通过事上磨炼，心能达到一种中和状态，能够合宜地应对事情，这其中蕴含着知行合一的要求。作为一种应事的总原则，追求在动中做到心定，由此心定而致良知于事事物物，达到处事的最合适方式及内心的中和状态。格物致知即是知行合一，即是经由事上磨炼，从而致良知于事事物物。

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和事上磨炼，集中表现为一种实践精神。而实践精神是企业家精神中必不可少的一种精神。对企业家来说，一是修养心性，遇事能心定；二是，心定之后，选择应对事情的恰当方式。这是一种实践智慧。实践智慧之获得，需要通过反复的事上磨炼，不断总结失败的教训与成功的经验。遇事心定，并不意味着不动，而是动而中节，无过无不及。孔子推崇“临事而惧、好谋而成”¹³。如子路好勇，近乎鲁莽之勇，孔子并不推崇。孔子主张临事而惧，临渊履冰，戒慎恐惧。这里的惧，不是惧怕而退缩，而是一心在事上。

在这种惧之下，反而能达到心定。对企业家来说，遭逢困厄之际，鲁莽之勇和无知状态下的定和静，不是真正的定和静。只有临事而惧，惧而不乱，这时的定和静，才是真正的定与静。惧要有一个节制，不能过，也不能不惧。对企业家来说，临事而惧，达到心定，进而选择应对这一困厄的最恰当方式，由此好谋而成。

2. 创新精神

无论是对于民族和国家来说，还是对于企业和个人来说，创新都是必不可少的精神特质。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乃是支撑一个企业持久发展的动力之源。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中极力呼吁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在一个企业之中，诸如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所有层面的创新，皆发源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秉持着创新精神，企业家的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才能有效激发出来。

阳明心学是满富创新精神的新儒学，创新与变革乃是阳明心学重要的思想特质。从王阳明与朱熹的诸点争议中，可以充分证实这一点。由于阳明心学对传统儒学的创新和突破，杜维明认为“阳明对儒学所作贡献同马丁·路德对基督教所作贡献一样深刻。”¹⁴路德宗教改革，将信仰的权力从教会那里，转移到普通人手上。

基督教得以世俗化，信徒因信称义。王阳明使儒学的传授，由官方性的儒生群体，转移到民间各个阶层，涉及到农夫、商人、乡绅等。将儒学由儒生知识分子的特权，转变为普通老百姓都能由其来锻造心性修养的一门学问。在这整个过程中，王阳明试图重构传统儒学体系。阳明心学中富有对传统儒学的改造和创新，其思想特质即是追求对旧有体系的突破，这可以为企业家精神的创新精神提供一种典范。

阳明心学的心即理、心外无物等观点特别重视人内在的主体能动性，强调以心来创发一切，突出内心的发动。杜维明认为，

孙中山的行动学说、熊十力的心灵哲学、毛泽东的实践论都多少受到了阳明思想方式的影响。¹⁵这说明阳明心学所凸显的人内在的心力，在促进人的发动力与创造力上，起着重要作用。

阳明心学强调心即理，突出人作为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强调由内而外、由自身到世界的开拓性。相较之下，朱熹理学则注重外在实体的形式性原则，突出世界作为实体的控制性，强调人对世界的依从性。这就是为何阳明心学在现代受到企业家群体如此追捧的原因之一。企业家在商业实践中，需要具备开创精神、创业精神、创新精神，从而由无到有地开创、由少到多地开拓。

彼得·德鲁克说：“企业家从事创新，而创新是展现企业家精神的特殊手段。创新活动赋予资源一种新的能力，使它能创造财富。事实上，创新活动本身就创造了资源。”¹⁶彼得·德鲁克试图从需求和供给两个角度来理解创新。¹⁷二者可以相互协同、共同促进，二者皆意味着在既定基础上的突破，以有效的资源，提供最大的价值。

如上所述，阳明心学的学问特质与核心观点，表现着对既定秩序的变革和突破，凸显着创新精神。企业家在学习阳明心学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汲取阳明心学中所蕴含的变革与创新精神。只有在心中植入创新之动源，企业家才能秉持创新精神，发掘创新潜能，散发创新活力，进而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立于不败之地。

3. 主体精神

阳明心学改造了传统儒学心性工夫路径，将人的心性进阶与提升的依据，由外在天命或天理的框定，转移到人的内在主体性。在《大学问》中，弟子问及《大学》中所展现的大人之学何以在于明明德。王阳明解释说，大人与小人都有天地万物一体之仁，这即是人之明德，能感通天地万物。

大人与小人的区别在于，小人为私欲所蔽，也就遮蔽了其本身具有的明德，这就导致小人与天地万物隔绝开来，一体之仁受到遮蔽，蔽障越重，隔绝越深，不能仁通万物。由小人至大人的进阶，表现为明明德的过程。明明德，即是去除遮蔽人之明德的私欲，将天生具有的明德彰显出来，由此而复归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

陈来说：“由于阳明把‘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与《大学》三纲领之一的‘亲民’连成一体，比起孔子的博施济众和孟子的仁民爱物，更加凸显出儒学诚爱惻怛的悲悯情怀和对于社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¹⁸大人由明明德到亲民，彰显出一种主体精神。王阳明“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人人皆可成圣人”等思想，体现出对人性本善的笃定以及对人的内在主体性的尊崇。

阳明心学中的圣人精神、大人精神，包含着君子精神。圣人、大人可以理解为君子的升级版。企业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君子精神，底层支撑乃是大人精神、圣人精神所凸显出的主体精神。具体到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主体精神可以表现为企业家追求卓越、干事担当。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指出，支持企业家追求卓越。弘扬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敢于承担风险的精神，支持企业家敏锐捕捉市场机遇，不断开拓进取、拼搏奋进，争创一流企业、一流管理、一流产品、一流服务和一流企业文化，提供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人特我新的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在市场竞争中勇立潮头、脱颖而出，培育发展壮大更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领军企业。

《意见》中鼓励企业家干事担当，激发企业家致富思源的情怀，引导企业家认识改革开放为企业和个人施展才华提供的广阔空间、良好机遇、美好前景，先富带动后富，创造更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其中，企业家追求卓越，干事担当，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承担风险，这些行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气魄和精神，可划归为主体精神。

主体精神可以看作传统儒学中圣人精神与大人精神的现代表述。主体精神在现代工商实践活动中，将对企业家发挥重要的

激励和感召作用。稻盛和夫临危受命，敢于扛起，拯救日航。任正非在华为所经历的重重磨难之中，冲锋突围，浴火重生。这皆是企业家主体精神在现代工商实践活动中的活生生地体现。企业家在瞬息万变的商海风浪之中，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将远期势能与近期动能结合起来，顺应商业发展规律，敢于承担、经受磨炼、苦练内功、扛起责任，整个过程中展现出企业家的主体精神。

阳明心学中所蕴含的实践精神、创新精神、主体精神，与企业家在商业实践活动中所需要的精神特质十分契合。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与事上磨炼所凸现出来的实践精神，阳明心学对传统儒学的突破使其具有浓厚的创新精神，阳明心学“人人皆可成圣”所导向的主体精神，对培育企业家精神、改善企业经营管理、建构现代工商文明具有重要价值。

结语

阳明心学与企业家精神之所以能够汇通，并且在塑造企业家精神的过程中之所以能够发挥重要价值，其内在的原因和机理是多维度的。首先，人文思想与工商伦理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内在关系，这是阳明心学与企业家精神汇通的理论前提。其次，从历史发展来看，阳明心学曾经在中国传统工商伦理与日本工商伦理的塑造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而且仍然正在参与到中国现代工商伦理的转型过程中，这构成了阳明心学与企业家精神汇通的实践基础。第三，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所需要的实践精神、创新精神、主体精神等，可以从阳明心学中寻求传统思想资源，这是阳明心学与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契合之处，由此构成了阳明心学与企业家精神汇通的思想契合点。可以说，阳明心学对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塑造，将会参与塑造中国现代工商文明，进而推进华夏文明的现代革新。

注释：

1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3258 页。

2、3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9、15 页。

4 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75 页。

5 徐国利：《阳明心学的世俗化伦理观与明清徽商伦理思想的转换和建构》，《安徽史学》2009 年第 4 期。

6 贾亭在《新时代企业家精神重构的内在逻辑》（《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 年第 3 期）一文中，基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家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高度重视”“后工业社会的转型需要”“互联网时代个体特征的回归”这三个内在逻辑，将企业家精神重构为重视创新、凸显时代特征、强调法治精神。李国旺在《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内涵》（《中国中小企业》2017 年第 12 期）一文中，将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归纳为时代精神、亲民精神、创新精神、法治精神等。郭守贵在《关于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几点思考》（《新产经》2018 年第 5 期）一文中，将企业家精神总结为创新精神、冒险精神、创业精神、执着精神、诚信契约精神。

7、8、9、12 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9、38、19、36 页。

10 稻盛和夫：《干法》，曹岫云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52 页。

11 李明镜：《稻盛和夫：管理要学王阳明》，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47~253 页。

13 子曰：“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

14、15 杜维明：《青年王阳明：行动中的儒家思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 年版，第 2、1 页。

16、17 彼得·德鲁克：《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蔡文燕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36 页。在该书中，作者还详细分析了有目的的创新和创新机遇的七个来源：意外事件、不协调事件、程序需要、产业和市场结构、人口统计数据、认知的变化、新知识，详细参考第 25~170、40 页。

18 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年版，第 293 页。